

第十章

中国女性教育资源与区域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经济发展很快,但由于中国东西部区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状况差别较大,所以在此期间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有关人士均有卓识与建树,在诸多的研究报告和论著中,人们恰恰忽视了造成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以及西部经济恶性循环的一个潜在的持续作用的问题,这就是女性教育资源^①问题。

世界银行和其它机构近期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使我们意识到,注重对女童教育的投资很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收益最高的投资,他们翔实详尽的调查结果展示了投资女性的巨大经济效益(萨默斯,1995:10~23)。宏观经济研究业已证明,教育与全面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关系,在第一个三年教育期内,对劳动者的教育每增加一年,都可使GDP增长9%之多,在其后的三年中,每增加一年教育也会使GDP增长4%(萨默斯,1995:前言1)。投资全民特别是投资女性教育已在我国东部发达省区出现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假设,女性教育资源是实现区域社会长期持续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因素。那么,我国西部的贫困是造成女性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重要原因,而女性教育资源的贫乏又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使区域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前人研究的结果以及国家统计数据来做出分析。

一 中国女性教育资源状况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女性教育的剥夺问题,这种剥夺并不单是由于贫困造成的,而是由统治阶级思想和最顽固的封建意识形态造成的,这种影响至深至广,就是在

^① 女性教育资源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妇女受教育程度,即接受教育机会的多少和受教育水平的高低,这是反映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二,女性资源储备、可开发、可利用的程度,这是反映妇女贡献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

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区域。女性教育被剥夺问题既可以视为区域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后果，又将其视为这种循环的原因。这种现象曾引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关注，纷纷论证女子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中，有人提出推行女子教育的意义在于有利于生利、自强，有利于胎教和儿童的成长，认为女学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梁启超曾说过“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于是男子极苦。”尽管清末女学运动浪潮迭起，但旧中国女性教育资源仍然相当贫乏，解放前，中国90%的妇女是文盲。因此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几近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更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让更多的妇女接受教育，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做一名建设者，因此，随着女性教育资源的的增长，她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女性教育资源（或为女性文盲、半文盲）在我国一些边远贫困区域的状况仍在恶性循环之中，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的女性文盲均高于男性，这意味着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女性文盲多的问题，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全世界60%的文盲是妇女，而中国的女性文盲、半文盲已超过世界的百分比数（朱楚珠、蒋正华，转引自熊郁，1993：235）。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如下数据中看到中国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发展变化。

（一）中国女性教育资源的变化

1. 女性人口的文化构成

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全国6岁及6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总计为60 611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24 397万人，占40.25%。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计算，1987年在全国6岁及6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中，女性占42.36%，提高了2.11%。6岁及6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女性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女性总人数的56.33%，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以上女性人口已具有小学文化水平。

从每万人中各种文化程度人数的变化来看，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由1982年的4 025人上升到1987年的4 236人，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7人上升到2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286人上升到303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743人上升到927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1 694人上升到1 856人（见表10-1）。从表10-1中可以观察到每万人口中各级文化程度的男女之间的差别及城乡差别（熊郁，1993：231~232）。

表10-1 1982年、1987年全国6岁及6岁以上按性别每万人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

年份	地区	每万人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数（人）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82	全国	50	17	460	286	1259	743	2299	1694
1987	全国	68	28	474	303	1466	927	2229	1694
	城市	287	136	915	822	1774	1417	1615	1420
	农村	18	4	375	186	1396	816	2368	1955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1987年全国1%人口调查资料计算。

2. 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

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性别比,反映出男女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别逐渐缩小的趋势。高年龄组性别比高,男性人口文化程度高于女性;而低年龄组有文化程度的性别比虽高于总人口性别比,但从高年龄组到低年龄组呈下降趋势。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60岁及以上性别比为754.9:100。1987年虽有下降,但其性别比仍为542.6:100。而25岁~29岁年龄组,1982年性别比为127.6:100,1987年为127.1:100。20岁~24岁年龄组,1982年性别比为116.3:100,1987年为111.7:100(见表10-2)(朱楚珠、蒋正华,转引自熊郁,1993:233)。

表 10-2 中国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

年龄组 (岁)	性别比		年龄组 (岁)	性别比	
	1982年	1987年		1982年	1987年
6~9	120.3:100	114.4:100	34~39	168.8:100	147.9:100
10~14	117.6:100	113.7:100	40~44	208.3:100	151.3:100
15~19	117.5:100	112.6:100	45~49	297.7:100	151.3:100
20~24	116.3:100	111.7:100	50~54	448.1:100	274.9:100
25~29	127.6:100	127.1:100	55~59	547.2:100	403.5:100
30~34	157.4:100	142.5:100	60岁及以上	754.9:100	542.6:100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3. 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

中国女性教育资源在地区间、城乡间的构成是很不平衡的,如果仅就女性教育资源来看就已经显示出区域之间的较大差别。如北京市女性人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占普通文化程度女性总数的0.09%,上海市占0.07%,辽宁省占0.06%,四川省占0.04%,陕西省占0.04%,甘肃省占0.006%,青海省占0.003%,新疆自治区0.013%,西藏自治区没有一个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城乡之间的差异更大。1987年全国6岁及6岁以上的女性人口中,城市每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为136人,农村则只有4人,城市高出农村34倍;城市每万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数为822人,农村为186人,城市高出农村4.42倍;城市每万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人数为1417人,农村为816人,城市高出农村1.74倍,而城市每万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人数为1420人,则少于农村1955人(见表2)(朱楚珠、蒋正华,转引自熊郁,1993:234)。

(二) 中国女性人口文盲、半文盲状况

1. 文盲、半文盲的性别比较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女性文盲、半文盲人口数有所下降。但是,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在12岁及12岁以上的女性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仍有16452万人,占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的69.2%,为男性文盲、半文盲人口的1.25倍。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女性文盲、半文盲人数为15618万人,占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的72.15%,比1982年反而提高了2.95%(见表10-3)(朱楚珠、蒋正华,转引自熊郁,1993:234~235)。

表 10-3 中国女性人口文盲、半文盲状况

年份	文盲、半文盲人口数 (万人)			占 12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1982	23772	7320	16452	31.87	19.15	45.23
1987	22273	6655	15618	26.77	15.79	38.05

资料来源：根据 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 1987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

2. 城乡不同年龄组文盲、半文盲率比较

1982 年在低年龄组农村女性文盲是男性文盲的 4 倍~5 倍, 尤其是 15 岁组女性文盲率几乎是男性的 10 倍, 到高年龄组差别减小, 女性仍为男性的 3 倍左右, 农村仍高于城市。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30 岁以前的农村女性文盲率为城市的 7 倍左右, 老年以后, 这种差别减小, 基本上在 2 倍左右; 城市 25 岁以前年龄组, 女性文盲率是男性的 2 倍左右, 25 岁以后为 3 倍左右, 60 岁以上的女性文盲率为男性的 2.5 倍左右。从 1982 年~1990 年男性文盲状况来看, 农村与城市相比, 男性的差别没有扩大, 农村文盲率基本是城市的 3 倍左右, 说明男性的受教育机会在城市增长的同时, 农村也不断增长, 二者增长的速度相近。而女性则不同, 在低年龄组, 1990 年的差别反而比 1982 年的略大, 在城市已将文盲率降至很低程度时, 农村特别是农村女性的文盲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见表 10-4、表 10-5) (郑晓瑛, 1995: 23~25)。

从表 10-4、表 10-5 中可以全面看到, 中国文盲率之所以超过世界的百分比数, 主要是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的文盲群体, 而农村的高文盲率则主要是由女性的高文盲率所致。由此可以推论, 中国城乡的三大差别中, 最主要的是女性教育资源的差别, 女性教育资源不足是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最重要的潜在因素。

表 10-4 城市不同年代年龄组文盲率 (%)

年龄	1982			1990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总	8.9	24.6	16.4	6.3	13.5	12.2
15—	1.4	3.2	2.3	0.9	1.7	1.3
20—	1.6	5.0	3.2	1.0	2.2	1.6
25—	2.8	9.6	6.1	1.0	2.8	1.8
30—	4.2	12.7	8.2	1.8	5.8	3.7
35—	5.1	15.3	9.9	3.0	9.8	6.2
40—	8.3	24.3	16.0	3.9	12.2	7.8
45—	13.1	42.4	26.9	6.0	19.8	12.4
50—	18.5	59.4	37.2	10.3	32.6	21.1
55—	24.4	69.0	45.4	16.3	52.8	33.6
60+	39.7	85.1	63.6	31.0	76.5	54.3

表 10-5 农村不同年代年龄组文盲率

年龄	1982			1990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总	21.1	49.0	34.7	15.7	37.1	26.2

15—	4.7	16.5	10.5	3.6	9.6	6.6
20—	6.7	27.5	16.9	3.8	11.9	7.8
25—	11.0	44.6	25.8	3.6	15.1	9.3
30—	15.0	45.5	29.7	7.0	26.0	16.1
35—	15.0	48.6	31.4	10.5	33.9	21.9
40—	25.3	64.6	43.5	12.9	37.6	24.8
45—	36.4	81.4	57.6	18.4	51.3	34.0
50—	45.3	90.2	66.6	29.0	69.6	48.2
55—	51.7	93.3	71.9	49.5	83.4	61.1
60+	64.4	97.1	81.9	56.2	93.1	75.7

表 10-4、表 10-5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2)，(1991)。

(三) 女性教育资源的区域发展

1. 省级水平

所谓区域发展是个综合概念，衡量发展程度的指标很多，但经济发展水平和所辖地区人口受基础教育的程度是其中很重要的指标，而且这两个指标之间具有惊人的相关性。一个地区文盲率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已经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这一规律在中国也被无情地验证了。

将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10% 机器汇总资料和 1990 年全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密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国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是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 7 省市，文盲率平均为 10.25%，人口的经济密度平均为 4.1 人/万元；第二类有河北、山西、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陕西、新疆共 16 个省区，文盲率平均为 15.6%，人口的经济密度平均为 8.6 人/万元；第三类是安徽、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7 个省区，文盲率平均为 33.6%，人口的经济密度为 10.2%/万元（史静寰，1995）。虽然各省区之间发展都存在不平衡，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最明显的表现是本文所说的东西部发展差异。从表 10-6 中可以看到女性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

从表 10-6 的对比分析中看到女性教育资源的区域及级差的变化情况，在小学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但随着学历的升高，区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从各区域 15 岁以上女性人口文盲半文盲率来看，贵州、甘肃、青海、宁夏的文盲半文盲率要远远高于北京、天津、吉林三省，这也就说明西部女性教育资源匮乏与区域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

表 10-6 1990 年 8 省区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人口百分比

地区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中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
全国	27.68	31.59	41.22	38.51	39.43	47.59	32.00
北京	37.36	44.03	53.67	48.33	43.65	46.93	16.90
天津	35.38	38.97	52.03	47.73	43.90	48.95	18.20
吉林	31.95	36.79	47.15	45.33	43.97	49.62	19.34
广东	24.51	28.58	39.81	34.05	39.50	49.53	24.82
贵州	27.65	31.02	37.51	36.14	30.48	40.70	52.54
甘肃	25.69	29.39	35.98	34.61	34.22	42.68	53.67

青海	25.78	27.52	37.29	43.53	36.40	38.13	55.32
宁夏	26.01	28.33	33.60	42.18	40.16	43.93	43.82

资料来源：《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机器抽样汇总》第13页，表1—9。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省除中专层次外，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女性人口比例均低于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高于西部四省区，用数据可以看出的原因说明，广东省女性文盲率大大低于西部四省区（史静寰，1995）。西部女性文盲率直接影响了这些地区女性教育资源的程度，那么这种情况对西部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与潜在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县级水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994年~1995年对我国东西部24县乡的教育发展做了全面的实地调查，从所有的调查结果来看，女性教育资源在东西部的差异是明显的，特别是西部多民族混居区。如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临夏回族自治州北部的永靖县，1995年全县共有17个乡，2个镇，193个行政村，总人口18.98万人。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县市中，永靖是唯一的一个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县。境内除汉族之外，还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蒙古、朝鲜和满族等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2.6万人，占总人口的13.3%。改革十多年来，永靖县虽有发展，但其速度远远赶不上其它地区。到1994年，永靖仍然是甘肃省的20个干旱贫困县之一，既是国家“八七攻坚计划”的对象，也是甘肃省重点攻坚的“七县一片”的县之一。199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只有362元，县财政只有2000万元。由于贫困，永靖县教育发展缓慢，但是政府还是重视教育的投入，一个近20万人口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1993年财政收入2190万元，1994年2157万元，然而，县里对教育的投入1994年却高达693万元，占县财政收入的31%。但是，这笔经费的使用中，公用经费和人头费的比例却是13:187，这就是说，教育经费中的93%用于了教师的工资、福利等，在近700万元的教育费用中，只有45万元左右用于教学条件的维护和改善。这样，县文教局与县财政一样，也不得不采用赤字的办法办教育，现在每年的教育经费缺口都在50万元~60万元。

从1995年看，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94%，巩固率97%，毕业率93%，普及率76%。其中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72%（女童入学率57.5%）；小学入初中的升学率72%，初中入高中的升学率39%；中小学生在在校生辍学率：小学6%，初中4%，高中24%；据县文教局反映，永靖县每年大约有1000名左右的小学生辍学，而女童能念完小学的更是寥寥无几；据1994年2月的一份资料，永靖县有2000多名失学儿童。1993年全县小学生流失近千人，面临失学的1000多人，这个数字占小学生总数的10%还多；初中学生流失651人，占初中学生总数的近11%；高中学生流失77人，占高中学生总数的近4%。在这些流失生中，女童占到了一多半以上。女性新的文盲半文盲的增长，使原本就非常匮乏的女性教育资源雪上加霜，使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仍处于恶性循环之中。^①

^① 由于24县的教育调查报告均未刊，所以此处以脚注的形式注明出处，下同。参见丘泽奇：《永靖教育调查》。

与永靖县类似，甘肃省泾川县各级各类学生中的性别比例失调比较严重，见表10—7。

表10—7 1982、1990、1994年度泾川县女生入学情况

年 份	学龄儿童		小 学		中 学		职业中学		幼儿园	
	入学人数	%	入学人数	%	入学人数	%	入学人数	%	入园人数	%
1982	13110	81.0	18537	40.7	2855	27.0	7	5.7	—	—
1990	8479	98.2	12977	44.9	4232	34.3	83	17.0	1591	47.0
1994	11926	99.6	14767	46.6	3440	37.7	136	31.9	3249	48.8

注：学龄儿童百分比为入学率，小学、中学、职业中学的百分比为入学者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

1982年、1990年泾川县学龄入学率分别为87.1、98.6，而女童入学率则比平均入学率分别低6.1、0.4个百分点，直到1994年才基本持平。从纵向比较看，1982年以来，女生在同级同学中所占的比率是逐年上升的，但是，我们从表10—7中也明显看出，越到高年级，女生人数越少，而在职业中学里学习的女生就更少，查阅泾川县上述三年的教育综合报表得知，这三年中高三年级女生所占本学年度中同级学生的比率只有10%、22.4%、28.3%。

泾川县女童入学率低除了经济因素、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外，还有一个非经济因素。在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小学生上学年龄一般要到8岁~10岁。而女子的结婚年龄一般多在20岁~22岁之间，这就导致许多女学生尚未高中毕业，就早到结婚年龄了。如果高中毕业，在当地人看来已是大龄青年了，找一个理想的丈夫就较困难了，这也是女生在高年级比例低的一个原因。^①

从24县的调查报告总体来看，女童教育问题区域性特点十分明显，主要集中在边远、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山区和牧区。宁夏、甘肃、青海、贵州是女童教育问题最突出的省区（另外还有西藏）。据1990年统计，全国1.8亿文盲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在全国211.1万未入学的7—11岁学龄儿童中，女童就有171.3万，占81.1%，而上述西部4省区就占了全国未入学儿童的四分之一。由于历史的、经济的、地理的、社会的、民族文化的、宗教的以及教育的种种原因，使我国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成为一个处境十分不利的群体。女童入学率低，流失率高，造成了少数民族女性文盲大量产生。女性文盲率高，降低了女性资源的可利用程度，限制了妇女就业选择与发展的机会，直接影响了家庭生活质量，不利于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产生贫困、加剧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原因（课题组，1996）。

二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的解决途径：投资女童教育

关于我国西部地区妇女文盲半文盲的程度和匮乏的教育资源状况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目前尚无具体的答案。不过贫困确实大大降低了女性的教育资源。至1993学年，我国未入学女童173.4万，占未入学儿童的66.4%，其中半数集中在西部10省区。而西藏、贵州、

^① 参见尹伟先：《泾川县教育发展情况调查》。

青海、甘肃、宁夏是女童教育最为严重的5省区。由于女童入学率低，失学率高，形成“女童就学难—母亲素质差—女性教育资源贫乏—贫困愚昧—靠粗放劳动生存—多胎多育—女童就学更难”的恶性循环（周卫等，1995）。

（一）恶性循环的多因素分析

在如上的事实中看到，女性教育资源的贫乏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综合症。但是就西部地区而言，贫困和愚昧是造成文盲的最直接原因，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从我国女性文盲群体看，她们既是昨天经济贫困和教育剥夺的产物，又是今天恶性循环中的载体。通过分析我们知道，恶性循环的直接根源一是失学，二是复盲。导致女性失学或复盲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学习的环境障碍；二是女性学习的心理障碍。

1. 女性学习的环境障碍

女性学习的环境障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区域环境与家庭环境。由于我国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差异性，造成了各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女性文盲的形成与所处的乡镇的生产力水平和提供的教育条件有密切关系。

以农民人均收入作为乡镇经济的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与女童入学率和农民文盲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互关系。据有关人士对我国302个乡的调查中发现，1992年7岁~11岁女童入学率随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人均收入不足200元的乡为91.6%，500元~1000元的乡为94.6%，1500元及以上的乡为97.6%。因此，从整体上说，经济越发达，学龄女童入学率越高。同时农民人均收入还与文盲率密切相关，人均收入越低，农民文盲率越高，见表10-8（赖立，1994）。

表 10-8 302 个乡人均收入与文盲交互分类表

文盲率 (%)	人均年收入			乡数 (个)
	不足 500 元	501~1000 元	1000 元及以上	
1~2	29.8	61.1	9.1	131
3~4	35.2	50.0	14.8	54
5~6	42.3	53.8	3.9	26
7~8	61.9	28.6	9.5	21
9+	51.4	40.5	8.1	37

除了收入水平影响女童教育之外，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靠天养畜、乡土观念等等也影响着女童的入学率。诚然，各区域女性教育资源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因果关系，但区域贫困与女性教育资源匮乏所产生的恶性循环却是互为作用的原因和结果。

从家庭环境来看，有人研究后认为，影响女性教育资源的因素一般有三个：其一，女性文盲的形成与上一代的文化程度有明显的联系，同时也影响其下一代的成长。调查中发现，在2644名女性文盲中，有43.8%的人，父母同为文盲、半文盲；有8.3%的人，父母、配偶均为文盲、半文盲，也就是说她们始终处于文盲包围的家庭环境中。在女性文盲中其配偶是文

盲、半文盲的占 14.1%；在男性文盲中其配偶是文盲、半文盲的占 45.3%，这种文盲半文盲组合的家庭，对其子女又构成了新的文盲包围圈。其二，沉重的经济和家务负担给女性学习造成困难。在调查中发现最突出的问题是女性文盲家庭多子女现象严重。

表 10-9 女性文盲各年龄组所生子女数量的百分比 (%)

年龄组	家庭子女数 (个)							总计
	无子女	1	2	3	4	5 个以上	未回答	
35~40	0.8	12.7	47.7	28.1	8.3	2.2	0.2	100.0
30~34	0.8	21.8	49.0	21.4	4.5	1.6	0.9	100.0
25~29	1.7	27.8	51.8	14.9	2.6	0.2	1.0	100.0
20~24	8.3	33.5	23.1	2.9	0.0	0.0	32.2	100.0
15~19	6.2	7.0	1.6	1.2	0.0	0.0	84.0	100.0

从表 10-9 中可以看出，多子女现象主要集中于高年龄组，其中 30~40 岁的女性文盲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占女性文盲总数的 22%，占有三个及三个以上子女女性文盲数的 87%。这种高文盲率—高生育率—高文盲率的恶性循环将给个人、家庭、区域、国家带来不可低估的潜在影响。其三，“重男轻女”的社会偏见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在将各种环境障碍归类后发现，女性文盲因家庭经济困难，没钱上学的居首位，占 40.0%；家庭子女多，不能上学的位居第二，占 22.7%；缺乏文化环境和用字机会，重新复盲的占 13.4%；重男轻女，被剥夺教育机会的占 10.3%（赖立，1994）。

2、女性学习的心理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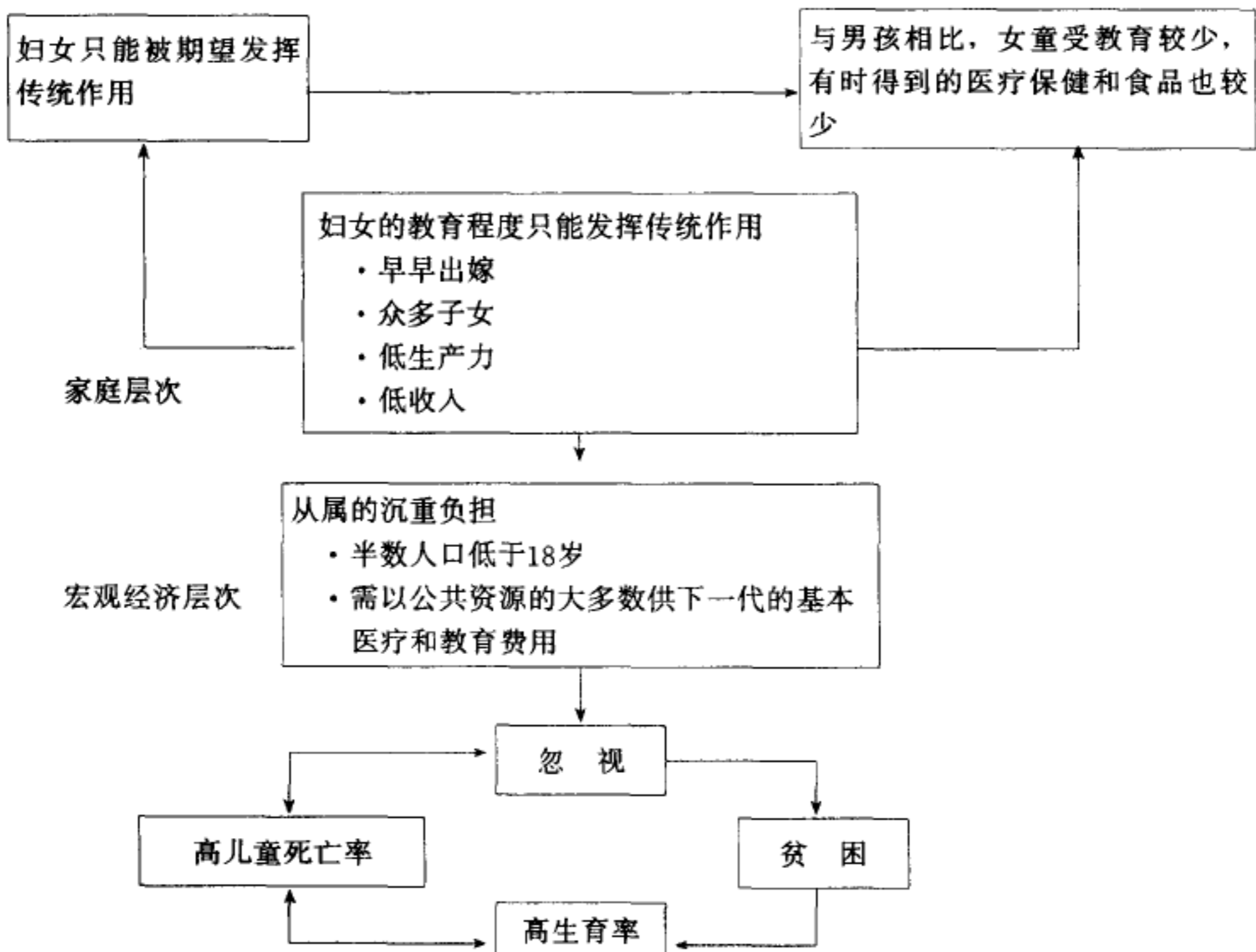
我国农村女性文盲的心理受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家族的、以及自身生理等方面的多重影响。在学习心理上的主要障碍表现为自卑、无信心、逃避和盲目。小农经济的封闭性限制了她们的视野、传统的封建意识扭曲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因而她们习惯于依附家庭、依附男性，不能认知或消极对待被剥夺的现状。其中认为穷乡僻壤学习文化用不上的占 20.9%；认为经济上的贫困与文化无关，文盲也可当万元户的占 23.0%；认为家里有孩子识字，自己不用扫盲的占 22.9%；认为自己年龄大，脑子笨，学了也白费劲，寄希望于自然脱盲的占 25.9%；女性文盲缺乏学习文化的内在动力，对参加扫盲抱有任务观点，或者是由于村干部逼着学，没办法，或者是怕受罚，她们把脱盲当作学习的终止目标，识字后，不巩固，不继续提高，久而久之，又重新复盲。由于态度不积极，目的不明确，对于脱盲 11.4% 的人没有信心，28.7% 的人没有把握（赖立，1994）。

(二) 解决方案：教育女童

教育女童是打碎女性被剥夺的恶性循环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如果考虑到教育女童的所有收益，那么这个事业所产生的收益要高于我国西部地区目前任何投资的收益。最明显的是，教育妇女可以提高其生产率。许多国家的大量计量经济证据已评估了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对工人工资的影响。这类证据说明，以增加工资的形式而形成的收益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来说都是大体相当的。根据粗略估计，每增加一年受教育时间，工资就会提高 10%~20%。在农村等地，教育妇女可以提高她们科学种植、养殖、管理的水平。尽管证据可以说明，增加男童

和女童的教育年限对其个人收益的影响是大体相当的，但教育女童在创造社会效益方面明显具有更高的效益。教育女童可以在5个方面产生非金钱效益：其一，即教育妇女能降低婴儿死亡率。通过城乡女性教育程度与婴儿死亡率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在具体国家的微观水平上进行的研究表明，受教育较多妇女的子女更健康。以非洲为例，一位文盲妇女的孩子在5岁之前死亡的可能性为20%；而受过5年教育的妇女所生子女的死亡风险则降低了40%以上；受过7年教育的妇女所生子女的死亡风险更是降低了50%多。其二，教育妇女能降低生育率。有很多统计数据说明，在女性教育资源较高的区域，生育水平也较低，在女性教育资源贫乏的区域，生育水平是失控的。在各国进行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其生育率即可降低5%~10%左右。其三，教育妇女能降低母婴死亡率。女性教育通过增加健康保健的知识和减少怀孕的平均次数，会极大地降低母婴死亡的风险。据有关研究指出，每增加1000位妇女受教育时间一年，就能防止两例母婴死亡。其四，教育妇女有助于防止疾病的传播。受过教育的妇女一般具有较高的卫生知识和健康意识，注重卫生行为和习惯的养成。其五，教育妇女具有重要的环境效益。1994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能够进行的环境保护投资中，对女性教育的投资具有最高的收益。教育妇女有利于提高她们的环保知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也提高她们的有效管理资源的能力。总之，教育妇女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价的，现在所要做的是让所有区域的妇女接受教育，正规教育先从女童抓起，实现女性剥夺的恶性循环向教育机会均等的良性循环转变。

1. 恶性循环



2. 良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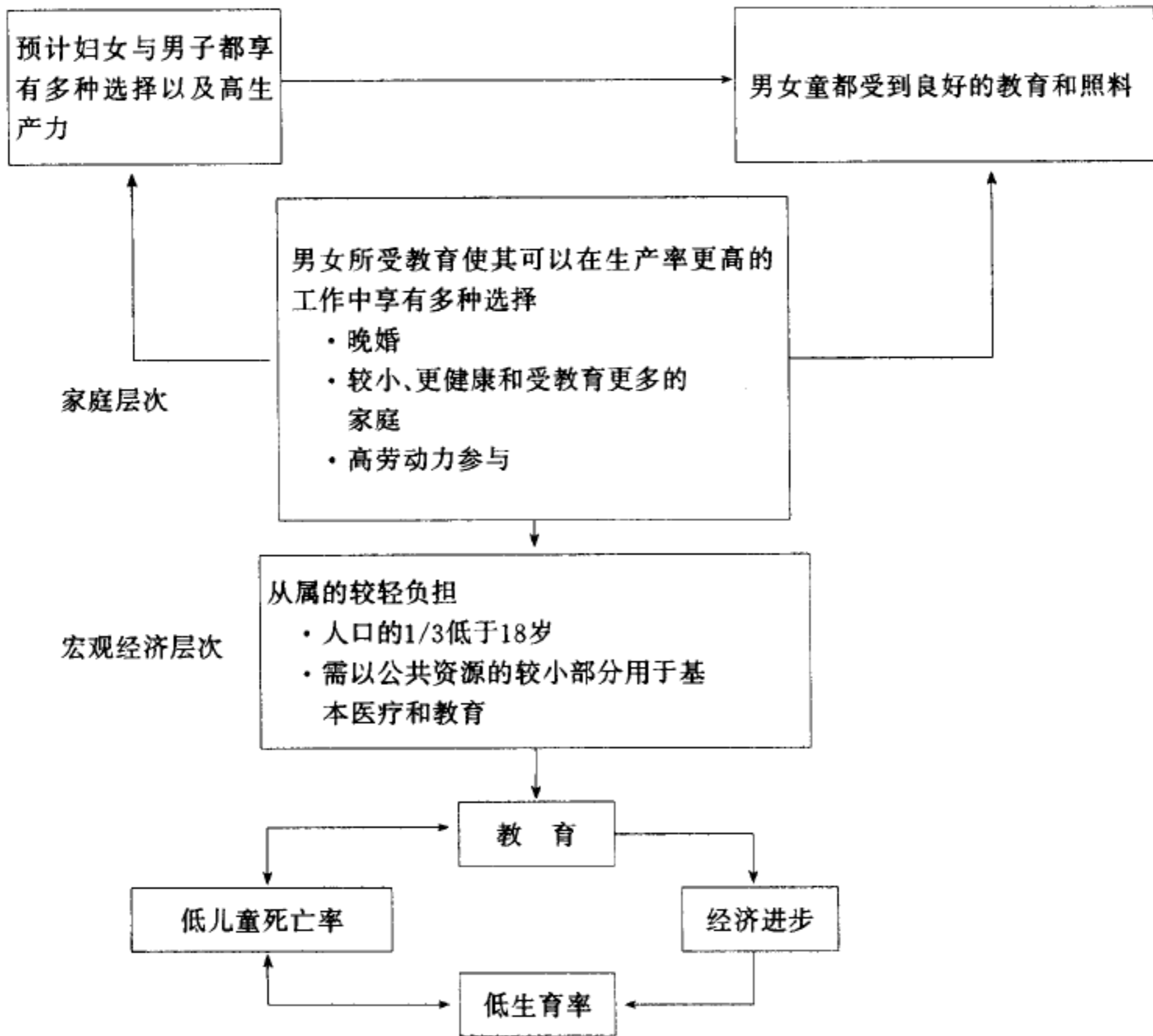


图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

三 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实验及效果

为了使贫困地区女童教育走向良性循环，由宁夏教科所牵头，与甘肃、青海、贵州省区协作研究，选择我国西部四省区少数民族聚居最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为研究的突破口，分别从现状、问题和对策着手，立足行动研究，拿出一批有效解决农村女童就学难的成功范例。在实验研究中侧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系统调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现状和主要问题，探究影响女童就学的主要障碍和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解决农村女童就学难的对策和实验假说。

- 以西部四省区不同类型、不同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农村小学进行以行动研究为基本特点的改进女童教育的革新实验，探索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难的可行措施和成功经验，以期在同类地区内推广、扩散。

- 在女童教育行动研究的实践中，寻求教育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育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行政决策的方法、途径，培养一支研究型教师队伍。

· 在行动研究过程中, 培养树立一批可以在女童教育、民族教育方面起示范作用的实验学校, 一方面扩大对外合作交流, 一方面带动促进本地区的女童教育 (课题组, 1996)。

(一) 研究过程与方法

该课题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女童就学难的实际问题出发, 从现状调查入手, 在追因调查、政策反馈、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整体优化女童教育环境”的实验假说, 并在西部 4 省区 16 个贫困县 9 个民族 (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撒拉族、土族、水族、苗族、侗族) 聚居的 28 所各种形式的乡以下农村小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调查和实验 (1992 年~1995 年)。1992 年 3 月至 7 月, 宁夏、甘肃、青海、贵州省区课题组对 16 个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28 所农村小学所在社区的女童教育现状及环境进行了系统调查, 并对上述社区的 5065 名多民族 7 周岁~15 周岁男女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回收率为 87%。调查组对在校学生、失学儿童、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及社区群众、民族宗教人士、教育部门、妇联、民委的行政干部分类型进行了诊断性访谈, 追因调查, 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发现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农村山区牧区影响女童就学和学习质量低下的主要障碍和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 对教育需求不高, 或无力负担杂费、书本费。据对 5065 名少年儿童抽样调查, 1991 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在 200 元以下的占 31.5%, 201 元~399 元的占 44.6%, 400 元~499 元的占 14.05%, 500 元以上的占 9.9%。

地方财力拮据, 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不足或无力征收, 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时有发生。学校缺乏课桌椅和必要的教学设备, 勤工俭学薄弱, 不少学校缺乏办学的必要条件。例如甘肃省通渭县 1991 年教育支出占县财政收入的 99.95%, 和政县则占到 104.35%, 即把全部财政收入用来办教育, 仍难以支付教育支出。教育人头费比例连年上升, 小学生均公用经费青海省只能维持在全年生均 0.15 元。宁夏回族聚居的固原地区 6 县小学校舍危房高达 12.3%, 小学生均图书 0.4 册, 全地区乡村小学有自然教室、自然实验教具能达到国家 III 类标准的不足 1%。

家长文化水平低, 对教育缺乏认识。据抽样调查 490 名未入学女童, 父亲是文盲的占 30.6%, 母亲是文盲的占 67.3%; 父亲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11.6%, 母亲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0.8%。在父母均是文盲的家庭, 很难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部分地区的女童教育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教戒律的束缚和早婚早育的习俗的不良影响, 据调查,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麻莲乡 12 岁~15 岁在校女学生中已订婚的, 占 22%。

山区、牧区不利的地理条件, 学校布点不足或缺乏住宿条件。据对 5 065 名少年儿童抽样调查, 单程上学路途需 31 分钟~50 分钟的学生为 488 人, 占 9.6%, 单程需 60 分钟以上的 575 人, 占 11.4%, 二者合计占五分之一强。山大沟深, 居住分散, 离校太远, 使一些年幼体弱的女童失去了入学的机会。

举办形式单一, 对非正规教育重视不够, 对于失学辍学女童缺乏补救性教育措施。

师资水平不高, 学校管理松弛, 教育方法不当, 造成女童学习困难, 中途辍学流失。据对 3 635 名小学在校生调查, 一年级留级频次为 1 157 人次, 二年级为 448 人次, 三年级为 332

人次,四年级为119人次,五年级为99人次,六年级为75人次,总留级频次为2 310人次,重复教育率为63.5%,其中留级五次的有22人。

课程内容缺乏民族特色、地方特色,脱离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对女童缺乏吸引力。

缺乏女教师,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教师,女童缺乏安定感和榜样的激励(课题组,1996)。

找到了女童教育障碍与区域环境的问题后,该课题组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我国西部4省区16个贫困县28所农村中学从1992年9月开始,开展了为期3年的女童教育革新试验。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合理有效的行动方案。其中,在课程革新方面大胆突破,他们根据农村、山区、牧区特点,为了加强课程的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各实验校在坚持按教学计划上好文化课的同时,早期渗透职教内容,还普遍开设了手工、折叠、编织、刺绣、缝纫、烹饪、果树栽培等活动课程,成立了各种课外兴趣小组。甘肃编写了《女能人手册》等十余种乡土教材;宁夏根据回族文化、心理特点编印了《阿语二百句》、《农村妇女必读》;贵州省榕江县根据水族、侗族、苗族特点,开设了民族歌舞、民族刺绣、民族器乐、民族历史等课程,大大增强了学校对女童的内在吸引力;青海省从牧区特点出发,要求实验班高年级女生初步掌握小型奶油分离器的使用与维修、接羔育羔实用技能(课题组,1996)。

(二) 主要研究成果及评价

1. 女童就学水平

1994学年与试验前的1991学年相比,28所试验小学在校女生由3002人增加到4213人,增加40.3%;学龄女童入学率甘肃平均由76%提高到90.6%,宁夏平均由70.5%提高到96.7%,青海平均由68.9%提高到92.4%,贵州平均由68.1%提高到92.5%。在校生年巩固率分别由80%、82%、78%、88.7%提高到98%~99%。学年末总留级率分别由11%、8.7%、15.5%、7.5%下降到3%、5.3%、5.8%、4.2%(见表10-10)。

表10-10 西部4省区女童教育试验前后女童就学水平对比(1991学年~1994学年)

省区	甘肃(5校)	宁夏(8校)	青海(9校)	贵州(6校)
在校学生总数(人)	2513—3134	2128—2272	2266—2613	1185—1387
在校女学生数(人)	1088—1419	921—1157	658—1102	335—535
女生占学生总数(%)	43.3—45.3	32.5—40.9	29.0—42.2	28.3—38.6
学龄女童入学率(%)	76.0—90.6	70.5—96.7	68.9—92.4	68.1—92.5
在校女生年巩固率(%)	80.0—99.0	82.0—98.0	78.0—98.6	88.7—98.3
学年末总留级率(%)	11.0—3.0	8.7—5.3	15.5—5.8	7.5—4.2
6岁女童学前班入班率(%)	20.0—45.6	68.8—85.9	48.5—71.0	36.1—51.3
女校长人数(人)	0.0—0.0	1.0—8.0	0.0—3.0	0.0—0.0
女教师比例(%)	3.0—37.5	34.0—41.5	35.0—55.0	35.2—41.2

2. 社会指标

通过对女童教育革新的试验,除了在女童就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外,还使贫困地区“重男轻女”等封建陋习和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当地群众和家长对女童教育的认识、期望值、价值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识到女性教育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特别是当

地政府对女童教育的认识提高以后，他们已经或正在把女童教育革新实验的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行政决策，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辐射和推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抓好南部山区回族女童工作，作为贯彻《纲要》，实现“两基”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决定从1995年起首先在11个贫困乡197所农村小学推广8所女童教育试验学校的经验，从1996年起，在南部山区8县全面展开。青海省化隆县已在19个乡镇23所小学扩散。贵州省榕江县政府在全县推广了3乡6校的成功经验，使全县的女童入学率由1991年的72.9%提高到94.4%，由女童教育的后进县一跃成为先进县。另外，在社区参与、管理水平、自主办学活力、科学研究队伍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树立了一批示范学校，推动了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发展（课题组，1996）。

女童教育在贫困地区受到重视并开始改善，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也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的理性选择。当然有人会问，投资女童教育什么时候见效，也有些人认为，教育女童是一种只能在长期见效的战略。那么有一则故事也许会有启发，有个人曾问肯尼迪总统的园丁，从一颗种子长成一棵大树要花多长时间。园丁告诉他要花100年，那个人答道：“那今天早上就播种吧，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3. 西部女童教育试验成果的评价及思考

该课题组经过了四年的试验与研究，在大规模系统调查西部四省区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探索了一条整体优化女童教育环境、有效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难的办学路子。试验着眼于革新教育观念，解决女童就学难，不是就教育抓教育，单纯抓提高女童入学率，而是致力于女童教育的社会、家庭和学校环境的整体优化。该课题组的试验成果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有关组织的注意，国家传媒也曾做过专题报道，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我国西部地区对女童教育与投资的情况是令人振奋的，但仅靠区域性的试验并不是彻底解决女童教育的最佳途径，但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呢？那就是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女童教育事业。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为贫困地区集资建造学校，特别是要就近建造适合女童上学的学校。一份关于我国西部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表明，女童不入学的最重要原因是：山区山高沟深，人们居住分散，而山区的学校或办学点又很少，学生上学要翻山越岭，徒步往返十余里甚至更远。这对于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困难。遇到下雨下雪天或是农忙时节，更是难以到学校上课；山区的教师数量不足，特别是女教师奇缺，很多学校根本没有女教师。而当地回民把女孩子送到只有男老师的学校是不放心的。

第二，必须使教育女童的事业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这意味着减少劳动市场对妇女的歧视，它还意味着降低父母送女孩上学的费用。由于教育女童的社会效益高于男童，因此，教育女童的费用低于男性这一点是适宜的。有关研究认为，要求学生支付书本学杂费的规定对女性入学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但对男性入学却几乎没有影响。应为女童建立奖学金，并免费为她们提供更多的书本和学习用品。

第三，必须以不违背文化价值观的方式来设计适合女童上学的、具有区域和民族特点的学校。女性入学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离家不很远，取决于必要的卫生设施的提供和感

到安全的环境,以及聘请女教师。在某些情况下,灵活的上课时间和提供必要的家务劳动也是有益的。

《中国教育报》1997年3月14日报道:“上饶九百辍学女童返校”,报道了昔日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在家的江西上饶县石人乡的31名女童重返校园。这是江西省上饶地区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春蕾计划”的一个缩影。据悉,近一年来,上饶地区共为失学辍学女童捐款14万多元,使906名辍学女童重返校园。

为了让全社会热心参与“春蕾行动”,上饶地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带头扶助一名以上失学辍学女童。仅上饶地区妇联14名干部就救助失学辍学女童15名。同时,积极向全区各单位、广大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号召社会各界为辍学女童重返校园献一份爱心,出一份力量,上饶县郑坊乡党政班子11人每人都扶助了一名失学辍学女童。地区妇联还积极争取联合国儿童基金扶助失学辍学女童项目,在上饶县石人乡办起了一个女童班,使31名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的失学辍学女童返校就读。仅上饶县一地,通过采取措施动员女童入学的就达1500余人。

从如上数据与事例分析中,本文可以初步得出四个结论。

首先,在许多贫困地区过高的妇女文盲率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区域经济贫困是妇女被剥夺这个更严重问题的最明显的后果。

第二,妇女被剥夺起源于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女童不被指望对家庭作出经济贡献,也不被指望有什么自我实现的征兆,因此她们就得不到教育。

第三,靠全社会增加对女童的教育机会为粉碎这种恶性循环展示了最光明的前景。增加用于教育女童的支出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四,用不太多的费用就能提高全国上学女童的比例。不论何时,女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改造社会的潜能,促进区域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四 女性教育资源与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

(一)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

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人类初期,尤其在传统的农林业实践和水资源管理中可找到它的萌芽。例如,中国的《吕氏春秋·义赏》中就提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已含有持续利用可更新资源的思想。但是科学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却是在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逐渐提高,以及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认识过程中形成、完善与成熟的(龚建华,1996)。

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7月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提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对当前人类在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和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个为世人普遍接受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自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一个焦点。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工程技术等都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分别从本学科的观念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尽管各家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思想上是统一的。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点：一是公平性原则；二是持续性原则；三是共同性原则。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含义，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去理解。

首先，可持续发展就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共同协调进化，达到人与自然在发展进化中的互惠性，在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亦要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特别是环境的与资源的。

第二，注重人文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达到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的、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注重女性教育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尤其重要。

第三，社会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落实到特定的区域，由于社会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和区域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差异性，各个区域间的社会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只有在各个区域相互开放的基础上，充分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扩大教育资源特别是区域女性教育资源，开展区域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才会使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步。

（二）女性教育资源与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

女性教育资源在影响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为突出的是：区域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女性教育资源与中国区域人口现状

人口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女性教育资源是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占亚洲总人口的1/3多。中国自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全国每年净增人口在1500万左右，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超过1亿人。据有关调查揭示，在四川省，六七十年代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在八九十年代已经进入婚育期，而1986年~1995年又一个新的生育高峰期间，每年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都在100万以上。由于人口增长的周期性作用，预计2011年~2016年，人口再次出现生育高峰，进入婚育期的妇女人数将再次超过年均100万。在我国西部农村不仅2孩生育相当普遍，3孩和4孩以上亦占全年出生婴儿的1/5。西部四省区中，早婚现象十分严重，贵州省最高达到7.15%，最低的四川省也有4.23%。1982年~1990年，四川、广西、贵州和陕西四省区早婚率增幅最大的首推陕西省（91.7%），其次是四川省（76%）。80年代末期，四省区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比70年代末下降了0.5岁~1.5岁。各种违法婚姻呈上升势头。1982年~1990年，违法婚姻率超过30%的省市全国共有10个，其中5个在西部地区，最高的是贵州省，以其65.24%的违法婚姻率位居全国之冠。早婚的直接原因是文盲与经济贫困所致，早婚的直接后果是早孕和早育。1989年15岁~20岁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比较，低于或刚到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的妇女生育率，全国平均达到总和生育率的1/10左右，西部地区有5个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四川比全国

水平高近30%（何承金等，1997）。由此看来，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人口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致因。

在我国，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大约有1/4为新增人口消耗掉；每年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需要安排就业。人口增多使我国交通、教育、市政、社会福利诸方面也都面临巨大压力。中国的粮食、钢铁、煤炭、化肥、棉花等产品的总产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按人均占有量计算，排名就落在后面。人口已成了中国实现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纪晓岚，1996）。

1982年9月至1983年1月，中国进行了全国性的生育调查，为配合1982年的人口普查，也进行了10%抽样调查，详细询问了659000个生产队和居委会的一亿多人口，生育率的变化和生育模式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一项研究包括人口学家和教育家都感兴趣的是探讨学校教育和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该研究利用10%抽样调查数据，包括了252000名60岁以下的妇女。他们发现中国妇女平均只相当于小学文化水平。75%的农村妇女只受过小学教育，72%的城市妇女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调查还揭示出妇女文盲、半文盲百分比随年龄下降而下降的趋势。45岁~49岁妇女中75%是文盲，而20岁~24岁妇女只有25%的是文盲。调查中得到的年龄组识字率反映了30年扩大教育，特别是扩大女性教育的成果。虽然30岁以下的妇女的文盲率大大降低，10%抽样调查数据也指出，就性别分布而言，女性总体文盲率是男性的2.5倍，二者分别是42.27%和19.17%。该数据是根据2370万文盲、半文盲或者“12岁及以上，识字少于1500个，不能阅读普通出版物或报纸、不能写简单的便条”的调查人口计算出来的。该项研究最重要部分集中在教育水平和家庭规模的关系上。他们还抽取了35岁、40岁和45岁三个年龄组15000名妇女及其65000个子女的一个小样本。按农村和城市分别划分为五种教育水平，即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平均子女数呈反向变化。文盲或半文盲妇女平均有4.74个孩子，而高中组妇女只有1.94个孩子。农村妇女占中国妇女的80%，平均有4.4个孩子，而城市妇女有2.92个孩子。研究发现三个年龄段（35、40和45）的生育率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没受过教育或受过小学、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妇女的生育率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弗雷泽，1991：20~24）。

另一项关于识字水平和生育率的关系的重要研究是由印度新德里内务部总登记办的O.P.夏玛和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人口所的罗伯特·鲁瑟夫完成的。他们的统计分析五个变量的数据，包括“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女性识字水平百分比、城市居民百分比、两岁前儿童死亡率和平均初婚年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识字水平对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起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识字水平指的是被调查者能够用任何语言进行理解性的阅读和书写。作者的研究结论是：“区域水平研究表明，女性识字率对总和生育率有重大影响。女性识字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总和生育率下降0.5弱一点，即每个妇女略少生0.5个孩子。若某地的女性识字率是20%，则预测的总和生育率约为5.1；若某地的女性识字率是80%，则预测的总和生育率约为2.3。女性识字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一半是直接的，一半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降低儿童死亡率来间接地影响生育率。即女性识字率的提高会带来儿童死亡率的降低，儿童死亡率的降低又会导致总和生育率的降低。这主要是因为，较低的儿童死亡率意味着较多的存活子女，较多的存活子女意味着夫妇少生孩子即可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另-

间接影响是通过平均初婚年龄发生的,但与通过儿童死亡率的间接影响相比,其重要性要小的多。当控制了城市化水平后,女性识字率对总和生育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实际上都保持不变”(弗雷泽,1991:24~26)。

另外,有关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初婚年龄越大,越容易接受计划生育的观念和方法,从而生育子女的数量较少。一般来看,城市女性受教育年限较长,平均初婚年龄也就较高,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活动,提高自己多方面的能力。有关学者根据几次普查资料与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的城乡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情况表明,从70年代以来城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比农村女性高2岁左右。另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市和县(农村)为例,市男性和女性15岁~19岁已婚率为0.67%和1.92%,农村男性和女性15岁~19岁人口的已婚率分别为2.15%和5.55%。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崔凤垣等,1997)。因此,重视女童教育,延长妇女的教育年限,扩大妇女的教育资源,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与文化地位、妇女的健康地位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别,实现21世纪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2. 女性教育资源与区域人口、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们从上文看到,女性教育资源与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女性教育资源与出生率呈现出一种反比的关系,而与人口的质量则呈现出一种正比的关系。通过区域、城乡的比较,我们总结出,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有四种循环模式。一是:“高文盲率—高生育率—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密集—低经济报酬—高文盲率”;二是:“高生育率—低人口文化素质—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三是:“低文盲率—低生育率—高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密集—高经济报酬—低文盲率”;四是:“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质—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前两种是恶性循环模式,后两种是良性循环模式。

有关研究已经说明,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的最有效措施是教育女童,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对于控制人口增长具有战略意义,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育龄妇女中,高中与大学之间、小学与初中之间生育率的差别较明显。前者与晚婚有关,后者则反映出生育率的城乡差别。根据1981年的生育情况,如果把育龄妇女中的文盲、半文盲都提高到小学水平,那么全国生育率可从82.4%降到79.6%;如果再进一步在全国普及初中教育,生育率还可降到67.1%,基本接近发达国家妇女生育率的水平。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1985年以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1992年下降到25%左右。然而,占全国78.9%的人口在农村的格局无根本改变。尽管我国农村的非农产业产值不断地增加,但非农产业劳动者占农村劳动者的比重没有太大增加,1994年这一比重仅为12.2%,全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55%。全国女性就业者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76.12%,而且这部分人口规模还在扩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1991年的调查,农村20岁~54岁女性有91.03%是做家务和务农,从事副业(2.21%)、乡镇企业(3.94%)和个体商贩(0.76%)工作的女性比例很小,其人数只相当于农村男性从事这类职业人数的42%。由于不同职业的技术含量不同,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女性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30.2%,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99年,远低于全国女性劳动就业者平均6.06年的水平,其它行业女性在业人口中

文盲都不超过6%。可见,我国农村女性劳动者还不具备其它行业吸纳所必须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群体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成为女性劳动者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受阻的重要原因。

从女性就业构成层次来说,1992年我国女性劳动就业者占女性劳动年龄总人口的72.3%,占全部社会劳动者的44%,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世界就业女性占世界全部就业者总数34.5%的比例,说明我国妇女就业的广泛性。但是,我国女性教育资源现状对女性就业构成产生重要影响,女性就业主要分布在一些对技术需求较低的农、林、牧、渔、水利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76.09%)、工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12.76%)、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4.14%),但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女性只占该行业职工的36.98%,在金融保险业女性只占39.51%,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女性更少,只占22.65%。我国女性就业结构层次低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有关,因为这些职业对供职者的文化素质要求较高,如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03年,在金融保险业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59年,在国家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就业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09年,而在农林牧渔水利业的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有4.99年。显然,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现状不利于提高就业层次,不利于产业女劳力的转移,也难以提高女性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庄平,1996)。

我国长期存在的女性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而且不同性别人口随受教育水平提高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决定了女性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做出的直接贡献比男性低,其潜力远没有发掘出来。从我国女性教育已有水平看,仅就在妇女中普及小学教育,便可使我国未来15年少生1800万人这一项,每年节省下来的生活资料价值就达数百亿元。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受教育水平如果无法提高到接近男性受教育的程度,由于提高男性教育水平而取得的社会效益就会被抵消掉(庄平,1996)。

(三) 女性教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从我国目前来看,我国女性接受各种教育的学校数量和人数虽然都有显著增加,并且女性的教育程度也有较大提高,但同我国男性相比,同发达国家女性相比,其教育程度仍显示出偏低的态势。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的人口平均教育程度值为:男性平均值 $E = 2.65$,女性平均值 $E = 2.21$,仅停留在小学低年级程度上。另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计算的男性平均教育程度值 $E = 2.98$,接近初中水平,女性平均教育程度值 $E = 2.51$,仍为小学水平(顾宝冒、刘佩航,1993)。而我国西部和广大的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教育程度却在小学水平之下。增加女性教育资源的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女性的扫盲上,而应当放到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上。女性教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就在于,不但要注重提高现代的女性教育程度,而且要注意现代的女性教育程度对未来女性教育发展的影响。现在我们所应当做的是,所有适龄女童都必须入学接受教育外,高等教育中进一步增加女生的人数比例,专业、课程设置要扩大适合女性特点,逐步培养更多的高层次、高规格的女性科技人才,使女性教育资源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潜力和作用被逐渐地挖掘出来。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使西部女性教育资源做到可持续发展。我

们经过分析后认为,首先要重视扫盲的彻底性,杜绝复盲的可能性,让每一位妇女懂得,文盲对于子孙后代的贻害不仅仅是愚昧,所带来的是贫穷和衰落。其次,要树立起女童教育优先的观念,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女童受教育的权力,升学、考试、深造要有政策性倾斜。第三,对女性的教育应当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立足于实用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立足于我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

关于女性教育资源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本文可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女性教育资源状况是我国区域、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指标,消除差异,实现区域、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从女童抓起,变分利为生利之人,注重女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最为关键的。

第二,女性教育资源是影响我国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女性教育资源(减少女性文盲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在面向 21 世纪的展望中,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人才与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注重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而尽快提高女性的综合素质,扩大高科技队伍中的女性比例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全面拟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加速培训符合市场需要的各类人才。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她们从第一产业跨入第二、三产业,逐步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和就业层次。

参考文献(按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 崔凤垣等:《妇女地位研究方法新探》,《妇女研究论丛》1997(1)。
- 龚建华:《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概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3)。
- 顾宝冒、刘佩航:《妇女人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人口科学》1993(1)。
- 何承金等:《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与社会养老保障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7(1)。
- 课题组:《我国西部四省区女童教育研究》,《教育研究》1996(1)。
- 劳伦斯 H·萨默斯著:《投资于全民——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教育问题》(李燕生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 赖立:《我国农村女性文盲的分布和成因》,《妇女研究论丛》1994(4)。
- 纪晓岚:《21 世纪亚洲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2)。
- 史静寰:《中国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妇女研究论丛》1995(3)。
- 斯图沃特·厄斯金·弗雷泽著,楚红军译:《论教育对生育的影响》(内刊),第 20~24 页,1991。
- 庄平:《论女性教育的社会回报》,《社会学研究》1996(2)。
- 朱楚珠、蒋正华著:《中国女性人口》,熊郁主编:《面对 21 世纪的选择——当代妇女研究最新理论概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郑晓瑛主编:《中国女性人口问题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周卫等:《西北三省女童教育实验及思考》,《妇女研究论丛》1995(1)。